

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活动探析

王倩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 政治仪式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呈现政治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历逢国庆节, 中国共产党会积极组织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活动, 代表们通过参加接见宴请、观礼阅兵、献礼献旗、走访参观等形式多样的国庆仪式, 推动了新型民族关系的发展。运用政治符号和象征理论解读这一政治仪式, 可以清晰的看出国庆仪式催化了少数民族代表在心理、情感、思想等层面的剧烈转变, 这为推动少数民族群众参加巩固新生政权、实现政治动员、达成政治共识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过程促进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工作的全面开展, 亦成为建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国庆活动; 政治记忆; 少数民族代表; 政治仪式; 符号象征

【中图分类号】 D633; G7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7X (2022) 01-0005-16

DOI:10.13727/j.cnki.53-1191/c.20220107.013

新中国成立以降, 每逢周年都会举行各种国庆活动。在1950年首个国庆节, 来自36个少数民族的代表在首都北京组成游行队伍,^①其中有绿色“星月”旗下的四千多名回民代表, 有来自天山南北、甘肃青海、西南边疆等地的维吾尔族、藏族、苗族、瑶族、彝族等各少数民族同胞, 他们穿戴着节日服饰、奏着各民族乐曲, 边歌边舞像“一堆彩云”经过天安门广场, 由此“显现出新中国各民族友好团结的缩影”^②。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参与下, 新中国对外展现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象, 国庆节亦成为宣传民族政策、增进民族团结的重要节点。这一过程实质承载着中共在全面执政初期旗帜鲜明的民族工作导向、执政理念和政治意蕴, 其中更凭借着代表的少数民族身份、国庆仪式等丰富且具象的政治符号象征, 催化各族代表与全国人民共同生成特殊的政治记忆, 承载并传播了特定的政治文化与政治意义。

对此, 目前学界虽不乏佳作探讨, 但多侧重于少数民族参观团的具体实践, 或注重分析国庆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民族凝聚功能, 而从政治符号、政治象征及政治记忆等怎样转化为现实政治功能等方面, 即包括从个体与集体、地方与中央、民族与国家之间如何互动联结并建构出新型关系等角度的解读则着墨甚少。鉴于此, 本文以1950—1965年国庆活动为历史背景, 尝试运用政治象征理论及结构主义相关思维范式, 梳理各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动因流程和细节内容, 对蕴涵其中的政治符号、政治象征进行解读, 以此试图厘清中共在全面执政初期与少数民族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互动关联, 剖析代表们在国庆仪式的催化下形成了何种政治记忆、发生了怎样的心性转变, 最终总结这一过程蕴含的价值功能和现实意义, 以此为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工作、总结中共执政经验以及建构全新的民族国家形象研究提供另一个视角。

一、政治符号的生成: 选派少数民族代表赴京的动因与筹备

“任何符号都是双重使命, 既为生存目的服务, 又为政治目的服务。”^③符号作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媒介随处可见, 携有政治信息的符号都可视为政治符号。^④新中国成立初期, 民族地区因历史上长期受民族

【作者简介】 王倩,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的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4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史料收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1949-1966)” (18ZDA314) 阶段成果。

① 《欢迎各兄弟民族代表来京参加国庆盛典》, 载《人民日报》1950年9月30日。

② 《永远跟着毛主席走》, 载《人民日报》1950年10月3日。

③ [英] 特德 C. 卢埃林:《政治人类学导论》, 朱伦译,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27页。

④ 胡国胜:《试论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以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年第1期。

歧视与压迫,存有较多历史遗留问题,各地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中共为推行民族平等政策、全面打开民族工作局面,亟需与民族地区加强联络、增进交流,对此,中共制定了“上来下去”的民族工作形式,其中以选派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活动作为“上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代表们的少数民族身份就化作一项重要的政治符号,既可表象其个人的民族成分也可指代其所在的民族集体,成为了建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象中不可或缺的政治元素。

追溯这一政治符号生成的动因,大致可从两方面得出。其一,源于建构全新国家形象的客观需要。中共历来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尤其是“大汉族主义”,《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各民族平等,并要使新中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这就规定了国庆活动需要各族人民共同参加的价值主张,也成为展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象的客观需要。^①其二,出于对巩固中共新生政权的现实考量。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执政能力和民族工作经验尚且不足,亦无足够力量深入边疆全面开展民族工作;加之边疆地区多受封建残余及匪特活动等影响,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共了解甚少,此时亟需团结一切民族合力以推进全国域内的建党建政工作。因此,选派少数民族代表赴京观礼可帮助中共快速打开民族工作局面,但作为一项复杂的组织工作,只能选派各民族中最为“关键”“核心”的人员前往,再以其影响效力扩大活动成效。由此,各族代表以其少数民族身份赴京参加国庆活动这一政治符号在实践过程中逐步生成,这既代表了一种创新且巧妙的民族工作形式,又贴切的表象出中共意欲“体现各民族的大团结”的价值象征,并承载了要“在少数民族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显要的政治意图。^②显然,这一政治符号被赋予了更为深广的意义和功能。

为使政治符号发挥最大效能,代表们的属地来源成为中共首要考量的内容。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究竟有哪些民族,一共有多少民族,却是个不容易答复的问题”^③。对此,中共中央对赴京活动作出要求:“争取一个民族不漏,一个代表性人物不漏。”^④这正契合了中共推行各民族平等的价值旨向,正如毛泽东所述“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⑤。如此,从历年各族代表的整体性分布(具体详见表1)就可看出,不仅涵盖了东北、西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等所有区域,亦包括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充分体现出公平兼顾的选派原则。另从赴京频率与代表数量的分布来看,少数民族成分偏多且情况愈为复杂的西南、西北等地区,往往成为选派的重点考量地域,综上均可管见中共意欲在最大范围、最大程度上实施政治动员的现实考量。以纵向节点举例来看,1950年,国庆活动甫一举行,此时民族类别尚未厘清,仅选派了百余人赴京验析活动效果;而至1956年,随活动逐年开展日趋成熟,并为贯彻中共八大会议精神以及着重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和工业建设,国庆期间共组织少数民族代表1300余人赴京,创下历来之最。^⑥1960年国庆节,为更好的配合西藏地区民主改革运动,组织来京的西藏地区代表数量相较其他地区则更多。^⑦由是观之,中共组织人数不等的少数民族代表团赴京,已不仅仅出于从整体统筹上对活动规模的灵活把控,更是欲意将政治符号所承载的信息和意义,融入并扩散到国庆活动以及民族工作实践的全过程之中。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② 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关于1959年国庆节组织本省少数民族赴京观礼团的通知》(1959年6月23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号:235-1-235-169~169。

③ 《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论文选(1951—1983)》,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④ 武翠英等:《和而不同 民族工作物象解读》,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页。

⑥ 《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宴会招待十五个各民族参观团》,载《人民日报》1956年10月9日。

⑦ 国务院:《国务院批转民委“关于一九六〇年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的请示报告”的通知》(1960年2月26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号:235-2-17-101。

表1 1950—1965年国庆节赴京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分配地区、民族数量、人数等情况表

年份	地区或数量	民族或数量	人数	备注
1950	内蒙、西北、西南、中南、华东、东北、中央直属省市等地区7个民族代表团	42个	158人	另有219位民族文工团团员
1951	西南区民族代表团	回族、摩西族、彝族、窝泥族、泰族、苗族、山头族、民家族、藏族、蒙古族、瑶族等民族	—	本年可能为不完全统计数据；另有新疆各民族新闻工作者参观团
1952	西藏致敬团；昌都、内蒙、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华东、华北等地区民族代表团	46个	300余人	
1953	西藏、昌都、四川省藏族自治区民族代表团	藏族等	99人	
1954	西藏地区代表团	藏族等	—	另有西藏歌舞团
1955	西藏、云南、贵州等地区民族代表团，四川省彝族代表团	20余个	362人	人数中包括西藏青年参观团；另有新疆、云南、青海、内蒙古牧区青年参观团，新疆省各民族交通实习团，中国佛教协会各民族代表团
1956	西藏、新疆、甘肃、青海、陕西、四川、云南、内蒙古、广东、延边等地区15个民族代表团	近30个民族	1300余人	并有4个少数民族青年参观团和1个新疆有色金属工业的民族干部参观团
1957	西藏、青海、云南、新疆、四川等地区民族代表团；畚族、满族代表团	20余个	700余人	并有新疆工业、教育、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西藏干部代表团
1958	新疆、青海、宁夏等地区民族代表团；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代表团	20余个	400余人	并有四川、云南、广西、新疆、青海等地区少数民族青年参观团以及全国民族出版工作会议代表
1959	16个少数民族代表团	50余个	1100余人	并有3个少数民族青年学习团
1960	云南、西藏、宁夏、新疆等地区民族代表团	藏族、维吾尔族等	600人	另有西藏青年和西藏妇女代表团
1961	内蒙古、新疆、西藏、广西、云南、吉林、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区9个民族代表团	蒙古族、藏族等	350余人	

表1(续)

年份	地区或数量	民族或数量	人数	备注
1962	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西藏、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区6个民族代表团	23个	330余人	辽宁、吉林、黑龙江合组1个代表团
1963	内蒙古、西藏、新疆、云南、四川、贵州、甘肃、福建、浙江等地区8个民族代表团	40个	484人	福建、浙江合组1个代表团;另有内蒙古、西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青年学习参观团160人
1964	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西藏、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青海、河北、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河南、广东、山东、福建、浙江、江西等地区22个民族代表团	45个	500人	与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的4个少数民族青年学习参观团人数共计714人
1965	西藏、新疆、内蒙古、广西、宁夏、云南、甘肃、青海、贵州、四川、广东、湖南等地区12个民族代表团	47个	400余人	另有少数民族青年学习参观团

注:此表注重统计参加国庆观礼等仪式的少数民族代表人数,部分年度包括一些汉族代表,但数量较少不影响对民族代表团总体规模的量化认知;另据1953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有41个少数民族,后经民族识别才确定我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236页。因此本文中所涉及的民族称谓皆按原文使用。详情参见《伟大的民族热爱!——记各民族代表团献礼仪式》,载《人民日报》1950年10月5日;《参加国庆盛典的各民族代表团相继愉快离京》,载《云南日报》1950年10月30日;《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建设新中国!》,载《人民日报》1951年10月17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 首都隆重举行庆祝典礼》,载《甘肃日报》1952年10月2日;《周恩来总理举行盛大宴会 招待西藏致敬团及各地民族代表》,载《甘肃日报》1952年10月22日;《西藏、昌都国庆观礼团等到京》,载《人民日报》1953年9月30日;《首都举行盛大的国庆节庆祝典礼 毛泽东主席检阅武装部队和人民游行队伍》,载《人民日报》1953年10月3日;《首都隆重举行国庆典礼 观礼台上一万多人观礼》,载《内蒙古日报》1954年10月3日;《民族事务委员会欢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载《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8日;《西藏地区参观团和西藏青年参观团到北京 贵州云南四川三省各族参观团到北京》,载《人民日报》1955年9月30日;《周恩来总理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来京观礼的战斗英雄和兄弟民族等代表》,载《新疆日报》1955年10月1日;《贺龙、陈毅、乌兰夫设宴欢迎各民族参观团》,载《人民日报》1956年9月30日;《许多民族参观团到京参加国庆观礼》,载《甘肃日报》1957年10月1日;《人大民族委员会和民族事务委员会欢宴各少数民族参观团》,载《人民日报》1958年10月5日;《我国家领导人接见部队观礼代表团同时接见几个少数民族参观团》,载《人民日报》1958年10月7日;《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乌兰夫欢宴五十多个民族的代表》,载《新疆日报》1959年10月5日;国务院:《批转民委“关于一九六〇年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的请示报告”的通知》(1960年2月26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号:235-2-17-101;《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主席等接见解放军和各民族国庆观礼代表》,载《人民日报》1960年10月8日;《政协举行晚会招待各民族参观团》,载《人民日报》1961年10月6日;《六个少数民族参观团到达北京参加国庆节观礼》,载《新疆日报》1962年10月1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维汉、陈叔通、林枫接见六个少数民族参观团负责人》,载《人民日报》1962年10月7日;《八个少数民族参观团到京参加国庆活动》,载《西藏日报》1963年10月5日;国务院:《批转民族事务委员会一九六四年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的计划》(1964年2月27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号:235-2-24-204~205;《二十二个少数民族参观团到京参加建国十五周年庆祝活动》,载《新疆日报》1964年10月1日;《各地劳模代表和少数民族参观团到京参加建国十六周年庆祝活动》,载《新疆日报》1965年10月1日。

除了关注少数民族类别的整体性分布，从个体化视角来看，充分挖掘利用好每一个代表的身份来源也至关重要。这源于个体身份这一政治符号是向同一民族群体传导中共政治意图最佳的媒介和载体。参加1950年国庆典礼的苗族代表赵哲忠、黎族代表王嫫东均来自海南岛，他们因解放前参加琼崖纵队与敌后革命斗争被选为代表；连南县瑶族代表房红白，因能团结瑶民并参加瑶区人民政府工作而当选。^①由此，较早接触“革命”“政权建设”等事业的代表以其身份与经历，为政治符号的确立树立了价值导向、增添了政治属性，这有利于以个体影响力对各地民族群众实施动员和改造。另外，选取代表们上、中、下不同阶层身份来源亦出自这种考量。早期为突破边疆的复杂形势，中共明确将争取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及宗教领袖人物作为首要任务，将此视作“进行群众工作”及取得“安定社会秩序”的前提。^②毛泽东曾言“不团结达赖、班禅，莫想去做什么工作”^③，邓小平也指出在民族地区“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开展任何民族工作必须要“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④。因此，各少数民族中极具威望与地位的代表人士，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派赴京的首要人选。1950年，赴京代表主要有少数民族代表人士中的土司、山官、活佛、堪布、毛拉等；^⑤1956年，代表中多数亦是各民族僧俗官员、头人、活佛、阿訇等代表人士。^⑥

诚然，自1950年国庆节伊始，亦有部分工人、农民、学生等作为代表进京，但其主要来自解放较早并很快实行民主改革的民族地区且占比不是很大。1958—1965年，赴京代表渐由各族中的工、农、牧、林业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积极分子、基层优秀干部、五好职工等人员构成，此时兼有民族代表人士参加。^⑦这一“重下轻上”的倒转趋势正是中共在推进民族工作过程中重心转变的映射。^⑧究此原因，是随着各地与外界交流增多且民主改革工作得以推进，为鼓励广大民族群众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共逐渐加大对各民族地区群众进行大力团结和争取，试图以各行业战线的典型、模范代表作为政治符号，发挥其示范引领的影响效应。

要确保政治符号发挥象征意蕴，国庆活动的组织落实成为重要途经和保障。对此，中共对代表们赴京始终秉持以积极态度并作出细致筹划。历年国庆节之前，中共中央即会提前统筹部署关于动员、选派、启程和返回等内容与流程并下发通知至地方，各地则结合实际予以贯彻落实，确定选派原则与实施方案，并制定细致到携带物品、身体状况、精神面貌、外出纪律、交通安全、饮食卫生等相关注意事项。^⑨在彼时国家财力受限的现实情况下，中共对代表赴京可谓重视之极，不惜在人、财、物方面予以大力投入。1950年首个国庆节，中共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之名向各族代表发出邀请，并将此“视为一项极为重要的

① 《广东云南少数民族代表启程来京参加国庆典礼》，载《人民日报》1950年9月15日。

② 《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1954年10月），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73页。

③ 《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5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⑤ 《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30页。

⑥ 《贺龙、陈毅、乌兰夫 设宴欢迎各民族参观团》，载《人民日报》1956年9月30日。

⑦ 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关于盛大庆祝建国十周年组织本省少数民族国庆参观团的工作计划》（1959年6月27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号：235-1-235-170~170；国务院：《批转民委“关于一九六〇年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的请示报告”的通知》（1960年3月16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号：235-2-17-101；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在国庆节时组织本省少数民族参观团的通知》（1961年8月21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号：235-1-255-216；《六个少数民族参观团到达北京参加国庆节观礼》，载《新疆日报》1962年10月1日；国务院：《批转民族事务委员会一九六三年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的计划》（1963年2月2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号：235-1-286-032~033；国务院：《批转民族事务委员会一九六四年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的计划》（1964年2月27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号：235-2-24-204~205；《参加建国十六周年庆祝活动 各地劳模代表和少数民族参观团到京》，载《新疆日报》1965年10月1日。

⑧ 需要指出的是，在西藏等民族工作推进较晚的民族地区，其代表仍主要为民族代表人士。此处所指的“重下轻上”是指随着民族工作的整体推进，从全国代表名额的整体性比重看出的调整与变化。

⑨ 参见区党委办公厅：《关于我区赴京国庆节观礼团出发应注意事项的通知》（1959年9月2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档号：X001-025-0138-0014。

政治工作”。为做好招待工作，特成立21人负责的“政务院少数民族招待委员会”，指定时任统战部长、政务院秘书长、中央民委主任委员的李维汉为主任，乌兰夫等为副主任，^① 下设招待、文化、保卫、卫生各组保证代表们在京期间的工作生活，同时另专设联络组每日送简报至政务院，以便及时了解掌握其思想动态和情况意见。^② 另就相关仪式活动如接待、观礼、参观等安排，中共亦会细致考量、有序规划，以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为例，国家民委根据各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以广西僮族自治区^③等11个省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3个省区、北京市等13个省市组成参观团，分别安排500人和300人两批次错峰至各地游览参观（详见表2），细致周密的统筹部署成为政治符号发挥效能的重要保证。

综上可知，选派各族代表以其少数民族身份赴京参加国庆活动，这一政治符号的生成极具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因素，其背后表象着多元的象征和意义，承载着多维度的政治意蕴和政治主张。这也正如政治人类学家阿布纳·科恩所述：“在每一个时刻，代表性符号都在把瞬间与永恒、个人与集体、地方与国家、利己与利他、私事与公事等等联系起来。”^④ 出于对建构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象的现实需要，少数民族代表成为促进国家与个人、中央与边疆迅速产生关联的纽带，并充分向外界展现出新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的价值旨向。

表2 1959年国庆节赴京观礼少数民族代表分配名额表

各省、市、自治区	人数	观礼参观时间
广西僮族自治区	70	国庆节前赴有关地方参观， 后来京参加国庆观礼
云南省	70	
四川省	70	
贵州省	70	
内蒙古自治区	60	
宁夏回族自治区	40	
广东省	40	
吉林省	40	
黑龙江省	40	
湖南省	30	
辽宁省	3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70	9月下旬直接来京， 国庆观礼后赴各地参观
甘肃省	50	
青海省	50	
北京市、上海市、河北省、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 江西省、陕西省、河南省、山东省、山西省、湖北省	70	于国庆节时直接来京参观观礼，后 去各地参观

注：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少数民族代表团，还包括全国青年联合会组织的民族青年参观团150人；西藏观礼团名额及办法另行通知。北京、河北等13个省市共组成70人的少数民族代表团，各省、市具体名额分配由国家民委另行通知。参见国务院：《转发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1959年国庆节组织少数民族观礼团的计划”的通知》（1959年6月2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号：143-001-0458-0003。

① 《李维汉等组成招待委员会招待各族代表来京参加国庆节》，载《人民日报》1950年9月2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第1卷），青岛：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第302页。

③ 广西僮族自治区1965年更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

④ [英] 特德·C. 卢埃林：《政治人类学导论》，朱伦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

二、政治记忆的形成：各族代表在京参加各类国庆仪式

政治仪式能够通过政治文化塑造一种稳定而持续性的群体情感和价值规范,^①在此过程中,“人们通过参与政治仪式而获得情感能量”^②,政治仪式亦通过唤醒→重构→固化→刻写的完整流程实现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③按照这一规律,各少数民族代表在共同参加国庆仪式的亲身经历中,在不同政治符号与象征的交互催化下,逐渐产生情感共鸣并生产与再生产和新生政权、国家、人民相关且特殊的政治记忆。

(一) 受到接见宴请

中共对于各少数民族代表的远道而来极为重视,提出要使其“欢欢喜喜而来,高高兴兴而去”的接待要求。^④代表们赴京后往往会受到统战、民委、政协、人大等战线领导人的接见和宴请,以此表示热烈欢迎。1950年国庆节前夕,西南各民族代表团受到政务院秘书长、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民委副主任乌兰夫等领导在北京东站的接站迎接,随即被送至西郊公园畅观楼休憩;^⑤西北少数民族代表抵京时亦受到中央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和李维汉、乌兰夫等分赴机场、车站的接见欢迎;^⑥1952年9月21-22日,华东、东北各民族观礼代表团先后到达北京,中央民委副主任委员刘格平、委员刘春等一行赴车站予以迎接。^⑦1965年10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彭真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负责人。^⑧不宁唯是,毛泽东对代表们赴京也极为重视,他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等政要多次接见全体赴京代表。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人物与公众的接触本身就富有仪式化成分,国家领袖更成为群体政治心理的象征符号。^⑨由此,接见仪式使得代表们与国家领袖得以近距离接触,亦表象出少数民族在新中国社会体系和权力秩序中的重要地位。这一过程迅速使代表个体与国家集体、边疆和中央之间建构出新的关系。

同时,政治仪式还被“广泛应用到新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构建和社会动员中”^⑩。党政部门或领导个人对代表们的宴请接待就是此类仪式的典型。除了对代表们的远道而来表示隆重欢迎,宴请接待还成为对其进行鼓舞和动员的重要途径。宴请接待基本以酒会、宴会等形式为主,会后常伴有杂技、歌舞、话剧、京剧等精心准备的节目表演,^⑪可见中共对代表们用心备至。宴会常常由全国政协、人大民委、国家民委等单位直接负责,亦或由分管民族工作的领导人单独宴请,如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贺龙、陈毅、乌兰夫等。在宴请仪式中,领导多以致辞讲话表达关怀和问候,并对民族工作抒发良好希冀。1950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发表致词,鼓励代表们要尽力消除民族隔阂和矛盾,加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⑫1956年10月11日,在国家民委的招待宴上,乌兰夫鼓舞代表们对民委工作提出更多

① 王海洲：《政治仪式的权力策略：基于象征理论与实践的政治学分析》，载《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

② [美] 张玉萍，张旭东，李杨：《文化大革命中政治仪式的失灵》，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③ 曾楠，张云皓：《政治仪式：国家认同建构的象征维度——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为考察对象》，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④ 《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研究》，第332页。

⑤ 《参加首次国庆盛典 西南各民族代表团抵京 并有各民族文工团同来献演》，载《人民日报》1950年9月27日。

⑥ 《新疆驻军及中南、华北少数民族代表抵京》，载《人民日报》1950年9月29日。

⑦ 《华东东北各族国庆观礼团抵京 西南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启程》，载《人民日报》1952年9月23日。

⑧ 《朱委员长接见少数民族参观团等》，载《新疆日报》1965年10月8日。

⑨ 马敏：《论“王者”、“核心”的政治历史逻辑》，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⑩ [美] 张玉萍，张旭东，李杨：《文化大革命中政治仪式的失灵》，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⑪ 具体参见《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晚会招待六个少数民族参观团》，载《新疆日报》1962年10月6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维汉、陈叔通、林枫接见六个少数民族参观团负责人》，载《人民日报》1962年10月7日；《朱委员长接见少数民族参观团等》，载《新疆日报》1965年10月8日。

⑫ 《周总理在宴会上致词》，载《人民日报》1950年9月30日。

意见以促进民族工作进步、各族人民团结。^① 1965年10月1日, 乌兰夫再次号召各民族人民要紧密团结, 为“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而努力”^②。可见, 宴请已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礼节性仪式, 更是向代表们传达政治意图的重要桥梁。无论接见还是宴请仪式, 都为各族代表和中共中央之间提供了增进互动交流的平台和形式, 这样的政治仪式也使代表们形成并强化了“我曾在场”的感受与记忆, 成为其重新判断自身身份和地位的重要信息标识。

(二) 观礼阅兵仪式

国庆阅兵作为国家层面极为盛大而重要的政治仪式, 能够发挥维系权力秩序稳定的作用, 并快速赢得民众对国家和政权的支持。^③ 这对于对新中国军事实力了解甚少的少数民族群众来说作用更为明显。一些边疆地区群众起初对国家实力持疑, 甚至存有另立山头的想法和打算。阅兵仪式正以其极大的感观震撼力和军事震慑力, 在代表们生产与再生产政治记忆的过程中增进了对国家和政权的认同。在1950—1965年的国庆节, 首都北京共举行了10次人民解放军阅兵式, 阅兵观礼后代表们逐渐对新中国军事实力产生强大信心。

在1950年首个人民武装部队检阅仪式上, 代表们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看了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阅兵式, 其中包括榴弹炮、高射炮、骑兵部队等, 大家在看见飞机坦克时都“欢欣地跳跃起来”^④, 感慨“再不怕有什么人敢于欺负我们”^⑤。1953年的国庆阅兵式, 代表们在看到步兵、摩托部队、轰炸机群等后, 为有“这样强大的国防力量热烈欢呼 and 鼓掌”^⑥。在1959年阅兵式上, 各少数民族代表看到我国自主制造的各种现代化武器装备, 包括最新式自动步枪、大炮、坦克、高速度喷气歼击机等, 不断向受检部队欢呼致敬, 热烈庆祝新中国现代化军队建设取得的光辉成就。^⑦ 此外, 阅兵仪式还打消了一些代表潜在反动的想法, 参加1952年国庆观礼的西康彝族代表, 在见识了“喷气式飞机和各种大炮”后, 深感中共武装力量的强大, 遂打了解放军“打不赢他们”的“自高自大的思想”, 另有“一些以为自己了不起, 与政府对立的个别顽固头人, 觉悟了过来”^⑧。盛大的国庆阅兵仪式以其极大的震慑力, 消除了部分民族群众潜在企图独立分化的可能, 使全体代表对新中国国防力量增强了自信心和自豪感, 强化形成了关于国家兴旺强盛的政治记忆。

(三) 献礼献旗致敬

在京期间, 各少数民族代表通常以敬献本民族珍贵礼物的方式, 表达对领袖的敬意和对国家的热爱。1950年9月上旬, 贵州省苗、彝、回各族代表, 赴京时携有献给庆祝国庆大会的锦旗和敬献毛泽东的礼服。^⑨ 傣族代表人士召存信则带着西双版纳各族人民献给毛泽东的4件珍贵礼物——金伞、贝叶经、普洱茶和傣族服装。10月3日晚, 代表们在中南海怀仁堂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献礼献旗致敬, 并为其披戴民族衣冠。维吾尔族代表献上维吾尔族帽子, 藏族代表们送上麝香、虫草、鹿茸、藏红花等西藏特产,^⑩ 献礼中还有红皮玉、贝母、玉石砚台、彝族风格木制碗盘以及各民族名贵特产。^⑪ 新中国成

① 《民族事务委员会设宴招待各民族参观团》, 载《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3日。

② 《人大民族委员会等宴请少数民族参观团》, 载《新疆日报》1965年10月2日。

③ 郭哲:《政治仪式与权力秩序——中国国庆大阅兵(1949-2009)的政治学分析》, 中国矿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6年。

④ 《永远跟着毛主席走》, 载《人民日报》1950年10月3日。

⑤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 载《人民日报》1951年3月22日。

⑥ 《首都举行盛大的国庆节庆祝典礼 毛泽东主席检阅武装部队和人民游行队伍》, 载《人民日报》1953年10月3日。

⑦ 《首都举行空前盛大阅兵游行》, 载《甘肃日报》1959年10月2日。

⑧ 《一九五二年国庆节西康彝族观礼代表阿雷五撒等五人返回西康后传达总结报告(摘要)》(1953年), 四川省档案馆藏, 档号: 建康017-11; 转引自赵峥:《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康少数民族代表参观访问内地述论》, 载《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7期。

⑨ 《北京庆祝国庆筹委会组成 国庆日将举行盛大阅兵典礼 贵州少数民族代表启程来京参加国庆节》, 载《人民日报》1950年9月10日。

⑩ 《西康藏族彝族代表抵渝 即将来京参加国庆盛典》, 载《人民日报》1950年9月19日。

⑪ 《新中国大团结的有力说明 各民族代表向毛主席献礼 为领袖们披戴民族衣冠 各文工团表演民族歌舞》, 载《宁夏日报》1950年10月7日。

立之初，赴京代表通常会以献赠本民族最为珍贵的礼物表达情感，对此，中共意识到高昂的献礼费用势必会造成群众经济负担，出于对群众利益的考量，中共中央于1953年专门下发指示以消除此类现象，要求少数民族代表赴京时不带或少带礼物，但出于尊重民族习惯仍保留了如藏族敬献哈达等献礼方式。^①在1959年国庆节上，40余个少数民族代表依次为毛泽东献上民族礼品，并为其披戴上自己民族的衣冠服饰。^②对此，礼物的敬献与交换不仅仅表达了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领导人的尊重、爱戴、敬仰与拥护之情，更表象了献礼蕴涵着民族关系协调、国家统一稳定、全国上下一心的政治象征。

献礼物品作为一种承载特殊意义的政治符号，成为联结起献礼和受礼双方情感与关系的纽带。这一过程与马塞尔·莫斯看待礼物馈赠与交换的意义有些共通之处，莫斯认为被人们视为珍品的礼物一旦被转送、传承，其中蕴涵的力量就得以显现，这一过程也不完全是“毫无功利性”的，其实质可能在于去“维系一种无法拒绝的利益结盟关系”^③。从逻辑上看，物品传递过程本身就富有一定礼仪性，^④代表们不仅仅以献礼寄托和表达民族感情，更为重要的是与国家新生政权之间产生互动。随着献礼的完成，物质交换和符号传递得以实现，其背后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代表们与国家集体、民族地区与中共中央之间开始形成关联，由此建构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关系。

（四）走访参观学习

走访参观作为一项极具导向的政治仪式，对于传递政治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以直观的景象对受众进行反复刺激和强化，可以使其产生特定的政治心理效应和定势。代表们在走访参观的过程中，亲睹了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直观地感受到内地成就和汉族文化。总体看来，一般会组织代表们在国庆观礼前后，以北京、天津为重点或至其他城市和地区进行参观学习，其中多有实行民主改革较早、发展较好的民族地区，如内蒙古自治区、延边朝鲜族自治区等，亦会有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型城市。1950年国庆节，代表们在京逗留将近月余，先后参观了战绩、兵器、劳模及民族文物等展览会，石景山发电、钢铁等工厂，回民学院、蒙藏学校、清华、北大等学校，并游览了富有人文底蕴的故宫、长城、天坛等名胜古迹，^⑤其所到之处受到了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1951年，新疆新闻工作者参观团于两个月内参观了西安、上海、南京、沈阳等各大城市，团长阿·祖努尼就切身感受到祖国的伟大和富饶，特别是“各族人民相互友爱的真实情谊”让他深受感动。^⑥1956年，中共中央安排代表们在国庆前后分批次前往不同城市参访，具体规划了赴上海、广州、西安、兰州、呼和浩特等地游览的共计19个批次1450人的代表团，目的在于侧重使其亲身感受祖国的建设成就。^⑦1962年，赴京的少数民族代表在国庆观礼后，亦在首都参观了工厂、郊区人民公社和游览名胜古迹等。^⑧走访参观是侧重于诉诸行为感受的仪式，最能使代表们快速感知中国经济建设“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发展程度，其背后的政治意图是对代表们实施思想上的改造与争取，也直观的为其镌刻出祖国伟大富饶、成就显著、经验先进的印象与记忆。

由是观之，代表们参加了多种形式的政治仪式后，经过观礼、阅兵、游行、参观等仪式的刺激和强化，直观地感受到祖国各处友爱、平等的氛围，形成了特殊的政治记忆。这一过程也逐渐催化了代表们政治心理的生成，使其重新建构起对中共领导、汉族文化进行判断和认知的思维图式。各少数民族代表在参加了政治仪式的经历影响下，其思想意识、心理感受和情感倾向开始发生本质性转向。

① 《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代表到内地参观不要携带礼物等问题的指示》（1953年8月26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页。

② 《民族大团圆》，载《人民日报》1959年10月10日。

③ [法] 马塞尔·莫斯：《论馈赠——传统社会的交换形式及其功能》，卢汇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④ 参见[英] 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⑤ 《参加国庆盛典的各民族代表团相继愉快离京》，载《云南日报》1950年10月30日。

⑥ 《各民族亲密团结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载《东北日报》1951年10月1日。

⑦ 国务院秘书厅：《关于今年国庆节以后外宾、少数民族、华侨分批去各地参观、访问、游览问题的通知》（1956年9月27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号：185-1-997-8。

⑧ 《六个少数民族参观团到达北京参加国庆节观礼》，载《新疆日报》1962年10月1日。

三、政治象征的催化：少数民族代表心理、情感、思想发生嬗变

政治象征被视为“一套意义系统和权力技术”，能够稳定权力秩序、表达政治意义，同时也是表达人们情感、愿望的重要形式，“象征旨在唤起人们的感情，而后促使人们采取行动”^①。代表们参加国庆活动的系统实践，均可表象出新中国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价值旨向，这种全新的人际知觉和文化体悟，促使代表们在共同的政治象征催化下产生心理、情感和思想质变。

首先发生转变的是代表们对于自身少数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赴京后代表们以平等的主体地位与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参加国庆仪式，这一过程表象出每个个体拥有平等的人格、尊严、价值等象征，亦使代表们不自觉的关联起在新旧政权下截然不同的处境和经历，这使得他们对曾经受到歧视、奴役和压迫的境遇深感痛恨，亦为自己现在同样以少数民族身份却成为新中国的主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1950年国庆节，马丕烈等回族代表认为正是因为正确的民族政策，大家“从此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翁”；青海蒙古族代表淋沁旺济勒也发出感慨，全国各族人民终于“从被压迫的痛苦生活中翻了身”，蒙古族人民也成为国家主人。^②更有少数民族代表曾在“大汉族主义”的压迫下，因少数民族身份受到歧视而不敢向外界表明自己的民族成分，现如今不用再为之隐瞒而感到万分欣喜，贵州苗族代表李儒云在谈及“一向为人瞧不起的苗家”，在解放后终于“抬起头”“翻了身”，他为苗民终于可以使用、穿戴自己民族的语言、服装，也能够“在人民的会场上讲话了”而心感欣慰。^③

更具有典型性的是藏族姑娘娜几，她直接将自己参加国庆仪式表象为自身命运转变和人生价值体现的象征。又逢第二个国庆节，她便回忆起自己曾随文工团参加首次国庆献礼仪式的经历，她感叹曾经被称为“死蛮子”的藏族同胞，是绝不可能拥有政治权利和学习机会的，但新中国成立后，西藏自治区有了自己的政府，她自己亦通过在西康民族学校进行学习，从曾经以砍柴为生的妇女成长为康定城关区民主妇女联合会主任，生活也有了巨大改善。^④除此之外，1960年国庆前夕，来京参加庆典的班禅额尔德尼感慨于民主改革在西藏地区的实行，消灭了封建农奴制度，使百万农奴得到解放成为“新社会和土地的主人”^⑤。由此，代表们由参加国庆仪式关联起自己和所属民族在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显著变化，强烈感受到现已挣脱了奴役和压迫，真正成为拥有各项权利的新中国主人，体认了中共推行的民族平等政策，强化了对于自身少数民族身份的认同。

其次是心理与情感层面的认同。政治象征的首要特征就是情感性，具象的政治象征往往潜在的包含着想往、渴望、热爱等情感寄托。^⑥代表们在赴京参加国庆仪式后，最为直观的感受到的中共对待自己的真诚态度，以此产生心理情感认同，逐渐开始疏解心结、打消顾虑，消除了对中共曾有的怀疑和误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因听信反动势力造谣诽谤，许多民族群众对新生政权心存疑虑，更有甚者部分边疆民族地区流传进京是对代表们进行“消除”的圈套，其实质是为了“祭祀”，众多少数民族群众尤其是民族地区代表人士，对进京产生恐惧、戒备甚至抵抗心理，云南一些头人不敢进京，一定要当地政府以汉族干部做担保，进京后也是带来贴身保镖以保护人身安全。^⑦赴京之前，各地代表的担忧和疑虑确有一定普遍性，李维汉对此曾予总结，一些代表对赴京“不免怀着许多顾虑与怀疑”。但是来京后，在中共和群众的高度重视和热烈欢迎下，代表们切身感受到温暖与关怀，纷纷发出“我幸而来了”的感叹。赴京后大家感到“毛主席，中央首长，各机关、招待所、工厂、学校……的同志对我们都那么尊重和亲切”“国民党对我们都是假的，这次上上下下都是真的”，代表们“普遍的反映是印象深，感动大，收获多”，最为显

① 马敏：《政治象征：概念、结构和特征的分析》，载《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6期。

② 《西北各兄弟民族代表题词庆祝国庆》，载《人民日报》1950年10月7日。

③ 柏生：《太阳照到西南深山里——访西南各民族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6日。

④ 《我为什么热爱祖国》，载《人民日报》1951年9月30日。

⑤ 《朱德委员长接见并宴请班禅 班禅严厉谴责联大所谓“西藏问题”列入议程》，载《人民日报》1960年9月28日。

⑥ 马敏：《政治象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页。

⑦ 卓人政：《由押人质到建民族团结碑——记1950年云南民族代表团国庆观礼》，载《百年潮》2009年第12期。

著的转变是由当初不敢进京到临行时“留恋毛主席，留恋北京，留恋工作同志们”，很多人更在临别时“禁不住落泪”^①。

1950年国庆节，代表田心桃回想起过去受到歧视压迫，而今在国庆观礼时倍受中共和政府的优待照顾，感到心中有“说不尽的感想，说不尽的苦”而大哭；^②代表龙辑五深感中共和各地领导、工作人员及群众的亲切与尊重，认为此行可谓是真正的“相见以诚”并“要上书毛主席重致谢意敬意”^③。西藏代表计晋美更是直接将各少数民族代表欢聚北京，归于“毛主席和人民解放军所创造”的结果。^④转变最为明显的当属云南代表洛左旺堆，他之前听信特务谣言进京时携带盒子枪作为防御，参加国庆活动后他愤怒的说：“还要枪做什么？回家后把枪锁在箱子里，让它生锈算了。”^⑤1951年，广东连南县的瑶族代表发出感叹：“谁能知道瑶人苦呢？只有毛主席。毛主席就是瑶族人民的大救星。”^⑥1959年10月3日，西藏观礼团团长崔科·顿珠泽仁将民族地区改变落后面貌的功劳，归于中共领导和汉族人民的无私援助，正因如此“各族人民对共产党和毛主席充满无限热爱”^⑦。由此代表们在政治上“更加靠拢”，更加“促进了团结”^⑧。代表们具体的体会到团结、友爱、合作、互助的民族政策，自然而然的消除了此前产生的顾虑与罅隙，^⑨从心理情感层面开始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产生真正认同。

最后是思想认识方面的认同。代表们以其亲身经历感知了新中国的发展成就，对国家实力产生新的判断，亦由此延伸到对自身民族的发展道路和前途命运进行思考。1950年国庆节，各少数民族代表在赴京途中，对沿途土地上的庄稼羡慕不置；来京后，在参观了工厂、医院、学校等“各种进步事业”后，赞叹“祖国有这么伟大”，并“深信前途无限光明”^⑩。这让代表们心生向往并对中共治国理政的能力产生信心，亦对自身民族由贫困、落后转向富足、进步的出路和前景，不仅有着“无限的希望”，而且“怀有充分的信心”^⑪。1952年12月，西北、西南地区代表在参观内地工厂后，由其先进生产力展望到新中国的工业化远景，意识到如若“没有先进的汉族老大哥的领导和帮助，我们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是不可能很快发展的”^⑫。对于民主改革实行较晚的西藏地区，这一迹象表现的尤为明显。1954年，西藏国庆观礼团副团长纳旺金巴一行感受到内地土地广大、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不仅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而且已建成能自主制造机器设备的工厂，对此感到十分欣喜。^⑬对此，团长朵噶·彭错饶杰直抒心意：“今后应根据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加强西藏民族的团结，积极发展生产及各项建设事业。”^⑭1955年10月11日，西藏地区参观团团长拉鲁·策旺多吉认为在中共的带领下才有了康藏、青藏两条公路通车，由此对

①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51年3月22日。

② 中共中央中南局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南区少数民族代表团赴京参加国庆报告》（1950年9月2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档号：X001-003-0238-0075-0076。

③ 中共中央中南局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南区参加国庆节各民族代表团总结报告》（1950年12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档号：X001-003-0238-0068。

④ 《周总理欢宴各民族代表 与会者频频为毛主席朱总司令健康干杯 一致表示亲密团结为巩固新中国而奋斗》，载《人民日报》1950年9月30日。

⑤ 卓人政：《由押人质到建民族团结碑——记1950年云南民族代表团国庆观礼》，载《百年潮》2009年第12期。

⑥ 《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建设新中国！》，载《人民日报》1951年10月17日。

⑦ 《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乌兰夫欢宴五十多个民族的代表》，载《新疆日报》1959年10月5日。

⑧ 中共中央中南局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南区参加国庆节各民族代表团总结报告》（1950年12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档号：X001-003-0238-0068。

⑨ 中共中央中南局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南区参加国庆节各民族代表团总结报告》（1950年12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档号：X001-003-0238-0068。

⑩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51年3月22日。

⑪ 《各民族代表团上书毛主席致敬》，载《云南日报》1950年10月30日。

⑫ 《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人民代表向毛主席报告到各地参观后的巨大收获》，载《人民日报》1952年12月18日。

⑬ 《副团长噶章·罗桑仁增、纳旺金巴向西藏各阶层人民广播》，载《人民日报》1954年6月29日。

⑭ 《西藏国庆观礼团团长朵噶·彭错饶杰向西藏僧俗官员、人民广播》，载《人民日报》1954年6月29日。

“祖国和西藏的各项建设取得更大的成就”产生更多期许,并表态一定会认真参观学习,^①他坚信藏族人民在中共领导下定能“走向繁荣幸福的光明大道”,坚定了要“把西藏建设事业搞好”的决心。^②1957年国庆节,班禅额尔德尼表露出要以实际行动“促进西藏建设发展”的意愿;^③在西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后的1960年9月底,班禅额尔德尼再次赴京参加国庆观礼时坚定地表示,只有坚定中共领导,与各民族团结互助才能走向繁荣、进步,这也是“自己获得解放的唯一的道路”^④。通过以国庆契机的亲身参观走访,代表们收获颇丰产生了“不看不知道,一看胜读十年书”的体会,^⑤由此在思想认识上产生极大转变。

由此可见,国庆活动以具象的仪式感为代表们提供了认知转变的强大扭力,在政治象征的引导和强化作用下,代表们逐渐开始产生身份认同,更重要的是转向信任中共领导的新生政权,并从心理情感和思想认识上体认并向往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心理、情感通过宣教、动员等方式转化为促进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的动能。

四、政治功能的显现:由符号象征向现实效用的价值转化

在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全过程中,多种政治符号、政治象征交互影响,成为承载和传递政治文化、政治意义的载体和凭证。在政治符号发挥沟通、导向和动员等作用下,并在政治记忆的反复强化刺激下,代表们在仪式活动中不断增进对中共政治意蕴的理解和认同,并将思想认识转化为具体实践的动能,从而以其自身影响效力推进和加快了民族工作的开展与政治社会化的进程。

(一) 较快的建构起新型民族关系,增强了新生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国庆活动的具体实践,使各少数民族代表走出家乡、来到北京,以国家主人身份参加国庆仪式,并受到各地各界欢迎和尊敬,体现出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这使其感受到新型民族关系的显现。1950年,在京参与的“每一件事”,让每一个代表感受到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已经亲密地团结起来”^⑥。10月22日的中华各民族联欢大会,被李维汉称为“历史上未曾有过也不能有的伟大的新事件”,体现出各民族“团结友爱的精神”^⑦,大会在致函毛泽东时也表明,过去各民族“歧视”“仇视”的不友好关系现已被“新的兄弟般的关系”替代。^⑧周恩来对此阐明,这是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现已发生根本改变,从过去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改变为平等、互助的关系。^⑨国庆活动这一有益形式,成为代表们感受各民族平等团结的直接来源,各民族一改曾经存有隔阂、罅隙的现状,增强了共同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合力,建构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

这一过程也增强了中共新生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合法性绝不单单是利用政治符号制造政治共识的问题,政治符号只是达成合法性的一个工具,如果民众在经济上得不到实惠,在政治上不能表达利益,无论用什么样的政治符号,都达不成政治共识,都存在合法性危机问题。”^⑩代表们在国庆活动中感受到民族政策的益处,逐渐达成政治共识。1952年,西北及西南地区代表在国庆参观过程中,从汉族人民对他们们的热情招待中感受到来自“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的“温暖”^⑪。在1958年10月4日的欢迎宴会中,对于国家民委副主任汪锋所述的“新的团结、友爱、互助和合作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日益发展和

① 《民族委员会和民族事务委员会举行宴会招待西藏、云南、四川、贵州各民族参观团》,载《人民日报》1955年10月12日。

② 《陈毅副总理设宴招待西藏两参观团》,载《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0日。

③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致电毛主席庆祝国庆》,载《甘肃日报》1957年10月3日。

④ 《朱德委员长接见并宴请班禅 班禅严厉谴责联大所谓“西藏问题”列入议程》,载《人民日报》1960年9月28日。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第1卷),第302页。

⑥ 《各民族代表团上书毛主席致敬》,载《云南日报》1950年10月30日。

⑦ 《显示着各民族空前的大团结 国内四十三个民族代表在北京举行盛大联欢会》,载《四川日报》1950年10月24日。

⑧ 《大会向毛主席致敬函》,载《云南日报》1950年10月24日。

⑨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周恩来同志对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论述选编》,1981年版,第11页。

⑩ 杨光斌:《政治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

⑪ 《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人民代表向毛主席报告到各地参观后的巨大收获》,载《人民日报》1952年12月18日。

加强”，代表们深表赞同与认可，并用各种民族语言欢呼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①对此，代表们将获得的平等团结地位归功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1959年10月5日，班禅额尔德尼称“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已经普遍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更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②。1964年10月1日，云南傣族参观团团长罗运通认为“各民族参观团通过国庆观礼活动”，亲眼看到“各民族的大团结”，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③。通过国庆活动，代表们与外界交流互通、增进了解，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使得代表们深深感受到自身社会地位的提升，由此认同中共领导的新生政权，巩固了其合法性基础。

（二）有效的诉诸各民族政治诉求，实现了最大范围的政治动员

借助国庆活动，代表们与中共领导人得以直接对话，大家契机向中共反映民族问题、表达民族诉求，其中最为显著的成效就是直接助推新中国成立初期最为复杂的民族识别工作开展。1950年，田心桃作为中南区苗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观礼，期间便向中共有关领导人诉诸了自己民族成分的问题，其阐述自己实为土家族，但因多种原因如今被载为苗族，这引起了中共上层的重视，也为后续将土家族认定为单一民族提供了重要依据。^④由此，国庆活动亦成为中共掌握少数民族情况、收集民族问题诉求的重要渠道。李维汉在总结1950年各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情况时指出，共汇总收集到代表们反映的7项要求，包括加快民族区域自治、兴办民族学校、发展民族文化事业等事项。^⑤同年，中南局统战部收集到本区代表经首次国庆观礼，反映在“经济、文化、卫生等方面”对其扶助的要求，随后即制定了相应工作办法予以积极解决。^⑥1952年，甘肃省人民政府针对西北行政委员会民委收集到代表们的问题意见，在进行研究后结合实际提出了具体办法。^⑦这体现出李维汉所述代表们前来参加国庆活动的积极作用，即陈述自己民族现状使中央“了解了各民族的情况和要求”^⑧。在实现了个人与国家的双向联通后，代表们诉诸了政治诉求，保障了民族权益，为中共进一步制定落实民族政策、处理民族事务奠定了基础。

此外，中共借助国庆活动可“使代表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对党的民族政策”产生“进一步的领会”^⑨，亦可向其传达精神指示使其明确政治任务。为庆祝首个国庆节，在1950年9月30日五千人干部大会上，代表们在会上聆听周恩来总理作“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报告，^⑩其中号召各族人民要自觉自愿、互让互助的解决民族问题和历史纠纷，形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广大力量；^⑪对此，代表们在离京前联合上书毛泽东时回应，一定把党和政府的深切关怀，以及“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残余对于我们国家的严重威胁”，告诉给本民族的每一个人。^⑫1952年，西北、西南地区代表也表示回去后一定要把汉族人民的热情关怀告诉各民族人民，并且坚决响应号召，努力增产节约，为巩固国防、建设祖国奋斗到底。^⑬1959年，乌兰夫在座谈会上向观礼团负责人传达坚决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和积极开展增产节

① 《人大民族委员会和民族事务委员会欢宴各少数民族参观团》，载《人民日报》1958年10月5日。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欢宴各民族观礼团和青年学习团负责人 李维汉讲话指出社会主义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发展的唯一道路》，载《人民日报》1959年10月6日。

③ 《人大民族委员会等单位举行酒会热烈欢迎各少数民族参观团》，载《西藏日报》1964年10月4日。

④ 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34~246页。

⑤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51年3月22日。

⑥ 中共中央中南局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南区参加国庆节各民族代表团总结报告》（1950年12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档号：X001-003-0238-0068。

⑦ 《[1953]府厅政字第0768号》（1953年6月29），甘肃省档案馆藏，档号：128-004-0021-0008。

⑧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51年3月22日。

⑨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51年3月22日。

⑩ 《在国庆前夕毛主席举行盛大庆祝宴会 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干部大会 周总理在大会上作了重要报告》，载《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日。

⑪ 《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载《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日。

⑫ 《各民族代表团上书毛主席致敬》，载《云南日报》1950年10月30日。

⑬ 《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人民代表向毛主席报告到各地参观后的巨大收获》，载《人民日报》1952年12月18日。

约运动的主要任务,并且对民族工作的开展提出了7项任务要求。^①1965年10月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冰对代表们发出号召,在“国际反帝统一战线日益壮大”之际,各族人民要进一步加强团结,共同迎接第三个五年计划。^②由此,国庆活动“上传下达”的作用得以显现,使得“各少数民族对于中央的民族政策有了更深刻的体会”^③,实现了最大范围的政治动员,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社会资源整合,为国家建设凝聚了民族合力。

(三) 较好的体认并传导了中共的政治意图,达成了新中国全员的政治共识

利用国庆活动传递中共的政治意图,实现了对代表们在思想上的争取和改造,为建设政权、民主改革、社会改造等民族工作推进营造了良好氛围。对于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这项重点任务,中共极力以从“缓”从“稳”的方针推进,旨在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和汉族人民共同步入社会主义道路,且最大程度的避免造成恐慌及社会动荡。1950年,中南区统战部在对本区代表赴京参加国庆活动的总结中,反思了使其接受社会改造的问题,其中指出正是因为对代表们在“直接有关的东西如农业生产手工业等方面引导不够”,所以导致对其帮助还不够更大。^④从这一侧面就能管窥中共在组织国庆活动时,对代表们实施争取和改造的政治意图。但出于保障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周恩来在同年9月29日的宴会上明示,“对于各民族的内部改革,则按照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觉悟和志愿,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⑤,尤其对于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土地、租息、婚姻等制度的改革,要务必从缓。^⑥

随着民族地区社会改造的逐步推进,国庆活动逐渐成为代表抒发要求改革、加快自治等意愿的平台。1950年10月17日和19日,代表们在“民族问题报告会”上了解了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情况,其中李维汉着重讲述了“认真实行区域自治”的问题,乌兰夫也引证内蒙古自治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向代表们阐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显著优势。^⑦对此,代表们借机表达了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态度,提出“各民族的区域自治要快点进行”,十分赞同“实行共同纲领中民族区域自治政策”^⑧。1954年国庆节,朵噶·彭错饶杰通过参观内蒙古自治区、延边朝鲜族自治区等,切身感受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好处,他认为要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西藏发展的标准来加快建成新西藏。^⑨西藏地区作为最后进行社会改革的民族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借助十周年国庆大典,亦表达了西藏群众拥护民主改革以实现彻底解放的迫切愿望,大家“热烈拥护彻底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和寺庙对群众的各种压榨与剥削”“要求迅速实现土地改革”成为“土地的主人”^⑩。1964年10月20日,来自工业、农业和畜牧业等行业的少数民族妇女代表,在全国妇联举行的招待会上表示要“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一定要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进行到底”^⑪。由此可见,代表们认同了走上民族区域自治和民主改革道路,少数民族群众亦逐渐达成政治共识,坚定了步入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态度。

有鉴于此,中共在推进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注重总结经验、发动宣传,借助代表们参加国庆仪式的

① 《乌兰夫在各民族观礼团座谈会上说 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继续大跃进》,载《人民日报》1959年10月9日。

② 《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酒会欢迎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和少数民族参观团》,载《内蒙古日报》1965年10月6日。

③ 《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和发展而斗争》,载《人民日报》1951年3月22日。

④ 中共中央中南局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南区参加国庆节各民族代表团总结报告》(1950年12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档号:X001-003-0238-0068。

⑤ 《周总理在宴会上致词》,载《人民日报》1950年9月30日。

⑥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1950年6月13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54~155页。

⑦ 《李维汉、乌兰夫正副主任委员向各民族代表报告民族政策 各民族要更亲密团结肃清残敌巩固国防》,载《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3日。

⑧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51年3月22日。

⑨ 《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事务组举行报告会 西藏国庆观礼团团长朵噶·彭错饶杰作报告》,载《人民日报》1954年6月29日。

⑩ 《朱委员长欢宴班禅额尔德尼》,载《人民日报》1959年9月26日。

⑪ 《欢庆各民族妇女大团结 全国妇联招待来京观礼的少数民族妇女代表》,载《人民日报》1964年10月21日。

契机对其进行教育和动员,^①代表们也意愿将“所亲历、亲见、亲闻告诉本民族”^②,由此,国庆仪式的社会效能和政治功能得以在民族工作实践中实现最大化。同时通过政治符号和象征的传递和转化,代表们对新中国的权力秩序和社会关系逐渐产生认同。特别是在民族政治利益诉求得以解决之后,从少数民族融入新中国发展进程的角度来看,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新型关系建构得以完成,中共亦在最大范围内促进实现了“全国上下一盘棋”的政治共识。

五、结语

回顾选派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具体实践,在国庆节欢庆、肃穆的氛围之中,参与全员形成了共同的政治记忆。仅从政治符号流动与表达的视角来看,在活动过程中,代表们的民族身份作为政治符号既表象了代表个人也指代其民族集体,这一政治符号成为联结个体与集体、地方与国家的重要凭证和纽带;我们亦可将接见、献礼、阅兵、参观、游行等展现政治行动的仪式视为政治符号,这些符号则侧重于诉诸人们的行为感受。但无论何种政治符号,最终都在国庆活动的系统实践中表象并传递出蕴涵在其中的抽象的或者内在的观念、精神、思想和感情,共同表达出新中国追求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价值旨向。

政治符号和政治象征的叠加强化最终也实现因应转化和催化作用,大致以“引起直觉”“隐喻联想”“引发认同”“产生信仰”“激发情绪”“形成态度”“支配行为”“促进沟通”^③等8个方面的促进模式,使代表们在参加国庆活动时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以来,并以政治记忆的反复刺激和强化,开始产生全新的身份、心理和政治认同,亦对中共新生政权的未知或原有认知偏差产生转变甚至完全颠覆,在建构新的认知体系过程中形成了全新的情感态度和思维图式。如若仅从政治仪式能够凝聚并强化情感的特点来看,国庆仪式会把人们在参加典礼庆贺中的情感,最终转移到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述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④,即民族甚至国家集体上来。^⑤这一过程不仅使代表们获得了对外界认知、情感表达及心灵慰藉的方式和途经,更重要的是将情感力量转化为具体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实践,体认理解并执行贯彻中共的执政理念和政治意图,最终促进了新中国全域和地方的协同发展。归根结底政治符号和象征,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载体,是向民众传递政治信息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⑥“国家亦使用象征的、仪式的内容与形式来建构其自身的权力结构与意义系统”^⑦。因此,代表们以参加国庆仪式的具体实践促进了新中国建构权力结构、稳定社会秩序。

政治仪式最为重要的就是聚焦于它的政治性。贯穿代表们参加各项活动的全过程,“促进各族人民和睦团结、友爱互助地共同发展生产、建设祖国”^⑧,是中共鲜明且显要的政治意图和目标旨向。中南局统战部在总结1950年本区代表参加国庆活动时强调,对于着重顾及对代表们的生活照顾而弱化了对其进行政治提升和思想教育,^⑨就可对其中的政治意图窥见一斑。因此,从表面形式上看,选派少数民族代表赴

① 国务院:《批转民族事务委员会一九六四年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的计划》(1964年2月27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号:235-2-24-204~205;国务院:《批转民族事务委员会一九六五年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计划》(1965年2月17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号:235-2-27-117~118。

②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51年3月22日。

③ 参见马起华:《政治行为》,台北:政治大学出版委员会,1978年版,第165~168页。

④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⑤ 马敏:《政治象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页。

⑥ 胡国胜:《政治符号:概念、特征与功能》,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⑦ 郭于华:《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载《读书》1999年第9期。

⑧ 甘肃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关于国庆节宣传注意事项的通知》(1964年9月8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号:254-001-0284-0009。

⑨ 中共中央中南局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南区参加国庆节各民族代表团总结报告》(1950年12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档号:X001-003-0238-0068。

京参加国庆活动,是一项富有国家层面动员性质的集体组织活动,但其实质承载着维护国家主权统一、社会安定的统战任务和建设新中国的政治动员目标。作为一项方法巧妙、成本较低、功效明显的民族工作,从筹划到实施的全过程,都体现出中共对推进民族工作和治国理政的系统思考。

在政治目标的导向下,国庆活动使得中共与各少数民族代表直接对话互动,加强了在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沟通与交流,代表们不仅表达了各项民族诉求,亦将民族政策与执政理念传达至民族地区,初步实现了消除民族隔阂、疏通民族关系、增进民族交流、化解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团结等基本成效,增强了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共领导新生政权的理解和认同。同时,中共利用代表们“关键少数”民族身份的政治符号对少数民族群众进行最大程度的争取和改造,为其全面深入的制定实施民族政策、整合民族地区社会资源、加快推进民族地区发展,并为在边疆民族地区顺利实施政权建设、民主改革及社会改造等各项民族工作,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前提基础。

综上,中共基本厘清了在全面执政初期开展民族工作、深化统战任务的头绪,最终达成了新中国全员在最大范围和程度上的政治共识,使各少数民族群众共同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之中,并向外界充分诠释了其治国理政理念和筹划愿景方向,建构出新中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形象。至此,选派少数民族代表参加国庆活动,这一极具时代特征和政治功能的民族工作实践方案,承载着中共在执政中不断深化统战工作经验的任务,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延续至今,^①对我国民族团结、统一稳定、凝聚合力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A Study of the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s Attended by the Minority Representative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NG Qian

(School of Marxism,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The most important function of political ceremony is to present some political significances. During the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ctively organized representatives of ethnic minorit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s in Beijing. These representatives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type of ethnic relations by participating in such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s as reception banquets, military parades, gift – and – flag presentation, and visit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political ceremony with political symbols and symbolic theories clearly reveals that the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s helped catalyze the drastic changes in the psychological, emotional and ideological dimensions of ethnic minority representatives,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ethnic minority people to help consolidate the new political power, realiz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reach a political consensus. These representatives' participation in the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s in Beijing promote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ethnic work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was an important way to build the image of a unified and multi – ethnic country.

Key words: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s; political memories; representatives of ethnic minorities; political ceremony; symbolism

(责任编辑 伍琼华)

① 除“文革”期间。